

何阿疑 读原著  
之二《史记·夏本纪》



# 人生第一课

龙吟

九月是开学的季节,母校、蒙师和人生的第一课就像人生的瑰宝一样珍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。

我的母校是家乡古老的祠堂改建而成的小学,蒙师是我爷爷的姐姐的孙女,而这位大表姐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“毛主席万岁”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如火如荼。人们目及之处,不是“毛主席语录”的标语,就是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,就连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,都是用这些标语和口号编辑而成的出版物。那时标配的教室,黑板正上方挂了一张宽额的毛主席画像,两边贴了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的毛主席语录。

记得大表姐给我们上第一课时,年龄还不到三十岁,她剪着齐耳的短发,柔美中展露的飒爽英姿,很有些像那个时代一幅宣传画中手握钢枪的女民兵。大表姐方步走进教室,放下教案、教鞭和粉笔盒,面朝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,领着我们齐诵“毛主席万岁”的早祷,然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公公正正地写了:“第一课毛主席万岁!”然后拿起教鞭指着黑板上粗大的粉笔字,又领着我们把“第一课毛主席万岁”读了三遍。

接下来,大表姐并没有解释“第一课毛主席万岁”的词义,而是从字的笔画顺序和偏旁部首讲起。她说第一课的“第”字是竹字头,“课”字是言字旁,笔画顺序则把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捺等作了全面的讲解。临了,“毛主席万岁”后面还有一个感叹号,大表姐就此又讲了逗号、句号等常用标点符号。就这样,大表姐足足用了一个上午四个课时才把第一课讲完,之后布置的家庭作业是要我们回去把“第一课毛主席万岁”连同那个感叹号抄写三遍。

第二天早自习时,大表姐检查了同学们的家庭作业。对那些抄写时漏了感叹号的同学,大表姐给了他们红勾带点的圈阅警示。接下来上的第二课是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”,这一课,大表姐重点讲了“战”字和“胜”字。她说“战”字不是占字旁而是戈字旁,“胜”字是月字旁而不是生字旁。可是,次日大表姐在课堂提问时点名问了三个同学“战”字是什么偏旁,三个同学都回答错了。之后,大表姐问班里还有谁知道“战”字是什么偏旁?一阵鸦雀无声后,我战战兢兢地举手站起来回答说:是戈字旁。为此,大表姐对我进行了表扬,并说这是举贤不避亲,还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。而且,我还因为这次突出表现,在之后不久的班干部选举中做了学习委员。

我之所以对这件过去了四十多年的小事还记得如此深刻,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课堂上受到老师的表扬,并因为这次表扬爱上了语文课,爱上了文学。

这期期末考试我得了双百分,并十分荣幸地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。暑假放假那天,父亲见我书包里有一张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,便好奇地打开书包看了我的课本和作业。看后,他问:“你们第一课学的是‘毛主席万岁’?”

我说“是的”,而后我问他:“你们读书第一课学的是什么呢?”

那时父亲任生产队长,四十多岁了,由于繁重的劳动和生产队长的职责所在,平时很少关心我的读书和学习。父亲本来读书不多,只认得简单的数码和汉字,他见我问了他的短处,便面有赧色地对我说:“我们那时读的是私塾,私塾先生给我发蒙上的第一课是一首诗:‘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。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。’”

父亲补充说,他那时读书上课前要背孙中山遗嘱。父亲清了清嗓子,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背诵起来:“余致力国民革命,凡四十年,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积四十年之经验,深知欲达到此目的,必须唤起民众,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,共同奋斗。”

现在父亲已经作古,而我不仅做了父亲,而且快要做爷爷了。这就是我将来要跟我孙子讲的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吧。

# 九州已定? 可“衡山之争”才刚开始

何芬

从夏禹结束禅让制,到夏启建立夏王朝,再到夏桀亡国,500多年的时光凝聚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里。我以为,最值得书写的反倒是夏禹治山治水,划分九州。

《史记·夏本纪》反映禹分九州一事的表述几乎照搬《尚书》中的《禹贡》,而《尚书·禹贡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理文献。从先秦文献《国语》《墨子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周礼》《考工记》对《禹贡》的引用,就可见《禹贡》一书写作年代较早,但不是一下子完成的。顾颉刚的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,不过大家在具体成书年代的问题上有分歧,但最晚不过汉代。

《禹贡》九州是哪九州?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是: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,大禹就是通过把大地上的洪水穿山过土,引入大江大河大海,逐步熟悉了九州的地形物产,依据实际情况划分了九州。

尽管,后来《汉书》没用九州说法,用的是十二州之说。但这里面提供的远古的“中国”的信息,是巨大的。现在学界一般认为,夏朝那时还没有实力真正的一统九州,夏朝势力范围依据夏朝国力是否强盛,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。

我翻完了郑州大学一篇120页的博士论文《〈禹贡〉与夏代社会》,才了解到:《禹贡》研究,从宋代开创到近现代进入繁荣时期,也与“信古——疑古——释古”的思潮同沉浮。到了当代,研究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。考古学科就曾要求:通过田野考古,为历史上“九州”“中国”概念的理解、重构上古周边集团与中原王朝关系等提供线索。

在《禹贡》九州中,我们衡阳在哪里?在荆州。但这也仅仅是现在我们衡阳这块区域在地球上的客观存在。据衡阳历史文化丛书《城邑沧桑》介绍,衡阳至今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,但1976年,衡阳市郊山坡、河床上曾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一些遗物。夏王朝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。我们衡阳倒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。比如1965年发现的南岳镇以东8公里的萧家大屋后彭家岭遗址,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,文化堆积层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,上层属于商代。

如果此时,我们阐发一下说,“新石器时代,我们南岳衡山脚下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了”,对不对?我觉得,那得首先保证那时得有“山”,最好是衡山,尤其是祝融峰。所以,衡阳本土文史界偶尔有会自己的哥德巴赫猜想,其中一位老师自己研究火文化的,他就提出大家有兴趣的来研究一下:祝融峰有多少岁了?其实我们翻阅资料可以推测祝融峰的岁数,虽然不见得精确。8亿年前,原始的雪峰山脉形成;距今2亿年,湖南现在的地貌轮廓才有一个雏形;大约是距今1.4亿年的时候,衡山主体得以形成;距今2600万年之后很久,大约要到洞庭水系开始形成时,衡山发生断层并继续上升至今。

所以说,从理论上来说,夏禹时期,“衡阳”这个地名还待考证。

就算是“湖南”这个名字,据《湖湘文化通论》《湖湘文化通史》考证,在唐代设置“湖南观察使”时才出现。但当时所治的湖南都只是指现在雪峰山脉以东湖南省东部,不包括现在的湖南西部地区。湖南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,在秦到明朝之前,都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行政区域。到了明朝,现在的我们湖南的全境才首次隶属于同一个省级行政区,即“湖广布政使司”。《湖南省志·地理志》显示,到了清康熙年间设“湖南布政使”,湖南的行政辖区范围才与我们现在湖南省的地理范围完全一致。

但为何《史记·夏本纪》里说到荆州,第一句就是“荆及衡阳唯荆州”?

这就是我所说的,九州看上去雏形已定,“衡山之争”才刚刚开始!这代表我们后来的人对远古的山水的一种探究。

“阳”指山的南面、水的北面。这里的“衡阳”指“衡山”之阳。这句话目前从字面上来看有两

个意思:其一,荆州就是指荆山到“衡山之阳”之间的这一块地方;其二,荆州是指“荆山到衡山”之阳的这一块地方。

在我们的观念里,衡阳因“衡山”而得名,这是躲不过的前世今生。那《禹贡》中的“衡山”是指我们湖南衡阳的南岳衡山吗?

有意思的是,紧接着,《史记·夏本纪》在照搬《禹贡》交待禹治山时,确实又提到了“衡山”这个地名。原文如下:“……汶山之阳至衡山,过九江,至于敷浅原。”

“史记三家注”中的《史记索隐》《史记正义》都成书于唐朝,作者分别是唐朝的司马贞与张守节。他们此时,在这个“衡山”字后注释,意思就是说湖南衡阳的岫岭山,叫衡山。

包括《史记》后面的《秦始皇本纪》也是引用《括地志》注释说:“衡山,一名岫岭山,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。”

但是,我们最好来看看原话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的原话是这样的:“始皇还,过彭城,斋戒祷祠,欲出周鼎泗水。使千人没水求之,弗得。乃西南渡淮水,之衡山、南郡。”

关于这个与秦始皇有关的“衡山”,于是又形成争论。《史记正义》已经说了,南郡就是“今荆州也”,并且还说,这句话的意思是“欲向衡山,即西北过南郡”,也就是说秦始皇是想去衡山,但不见得去了。但是仍有不同看法说,衡山与南郡一样,是指行政地名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里先后提到了“衡山国”“衡山王”。衡山国治所在“郟”,一般指湖北黄冈境内。但持此看法的人忘记了,目前还没发现秦始皇时期有“衡山”郡。

于是,我们又把问题回到“山”的问题上了。有人说,既然到了项羽时期,到了汉朝,曾出现过以“衡山”为名的行政区域,那说明这个区域内是有一座叫做“衡山”的山。就这样,安徽的天柱山(包括霍山、潜山一起的山脉)就作为荆洲山镇“衡山”进入人们视线。持此看法的人还反证,荆州“衡山”为湖南衡阳衡山的谬种流传最早源自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。班固在荆州“长沙国”条目说:“《禹贡》衡山在东南,荆州山。”

关于“衡山”的争论为什么那么多呢?我想,应该是与“三苗之居”“九州疆域”有关。不仅仅是“衡山”,“九江”“敷浅原”等等都有不同解释。释山释水,一直是文史界绕不开的命题。

之前,我写“何阿疑读原著”之一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,在文章结尾曾提出两个疑问:禹时期“三苗之居”的“洞庭湖与彭蠡湖之间”在哪里?“衡山在其北”又是指哪个“衡山”?

现在,《史记·夏本纪》又告诉我们,“衡山”又是《禹贡》九州疆域中最南的界限。

至于后来,与“衡山之争”相关的争论,即“南岳”是不是由从安徽天柱山南移到现在我们湖南衡阳的衡山;是不是从《周礼》开始,在经学体系就有南岳衡山是我们湖南衡山的认知了,这些分歧都可以概括为“南岳之变”。

写《史记地名考》的钱穆先生在他的自序里提出了考据地名的三个因素。意思大概是:一是地名有通用的意思,不见得就是专用名。比如“霍”,只要是“大山宫小山”这种形态的山都可以说是“霍”,但是不见得人家会用“霍”命名;二是说地名会有迁徙变化,有时一个氏族迁徙到一个新地方了,在新地方沿用以前自己居住地方的地名;三是说地名沿革,一般经济发达地区变化大一些,不发达地区变化小一些。钱穆还举例认为,“屈原投湘”的“湘”并不是现在的湘江。现在的湘江命名,与楚国南迁有关。

这样说吧,三苗的南迁,止于哪里,“衡山”是坐标之一,但目前考证,不是我们湖南衡阳的衡山。疆域的南扩,不同时代不同,作为四方五岳之一的南岳的位置难道不可以不同吗?通达天下,永远都是靠实力说话的。

衡阳本土文史专家萧培说,徐旭生的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一书,对学界聚讼有一定见解,文史爱好者可以一阅。